

李 辉 著

沙龙梦：现代文人的聚散之间

太阳下的蜡烛：郭沫若的沧桑岁月

鹤：何人知晓 夏衍

秋白茫茫：“文人参政”的 瞿秋白

往事已然苍老：宗派纷争中的 周扬 与 丁玲

落叶：豪爽 田汉 的最后悲凉

风景已远去：在固执与宽容之间的 鲁迅

困惑：梁思成 的幸或不幸

碑石：萧红 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

书生累：柳诒征 的起伏跌宕

清明时节：赵树理 在叩问

消失了的太平湖：老舍 与老北京一同远行

风雨中的雕像：柳公权 留下的遗产

沧桑看云

不应忘记的人与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沧桑看云

——不应忘记的人与事（上）

李 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李 辉 1956 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 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 年 11 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

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

1997 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 年 4 月，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6 年最佳散文家”。



李辉主编：“中国人物”丛书

(第一辑)

《我的同时代人》 巴 金 著

《走进巴金四十年》 陈丹晨 著

《历史背影》 贾植芳 著

《“二流堂”里外》 吴祖光 著

策 划：益琳福

责任编辑：黄孝阳

特邀编辑：张克俭

装帧设计：宁成春 范昊如

电脑制作：1802 工作室

题 记

朋友们常常奇怪我怎么尽爱写些陈年往事。

我说我在往昔中看到现实的影子。失去历史沧桑感，现实多少会显得苍白、轻飘。

妻子也爱开我玩笑：我看你是提前进入老年，和老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题？

我说我在老人面前感受着生命的丰富。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历史不仅仅告诉我们衰老，更给予我们青春和活力。

现实每天都在成为过去。

我们自己同样也在写着一部历史。

我乐意把笔浸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注视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

我喜欢诗人卞之琳的这首《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悠悠沧桑之中，一切人或事，都是飘动的云。它们相互映衬，方显出历史的复杂与丰富。

于是，我在看云。

其实，每个人都在看云。

目 录

沙龙梦——“京派文人”的聚与散	001
太阳下的蜡烛——郭沫若的沧桑岁月	015
鹤——谁人知晓聂绀弩	033
秋白茫茫——“文人参政”的瞿秋白	049
往事已然苍老——宗派纠纷中的周扬与丁玲	065
风落谁家？——走向“文革”的姚文元	083
残缺的窗栏板——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思考	101
落叶——豪爽田汉的最后悲凉	123
静听教堂回声——现代文人与基督教的关系	153
凝望雪峰——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	173
风景已远去——遥看夏衍背影	193
困惑——梁思成的幸或不幸	215

碑石——吴晗性格的复杂性与悲剧	237
旧梦重温时——“五七干校”的历史回望	259
书生累——邓拓的起伏跌宕	283
清明时节——赵树理在叩问	307
消失了的太平湖——老舍与老北京的命运	329
风雨中的雕像——胡风留下的遗产	355

沙龙梦

——“京派文人”的聚与散



好大的风，居然在秋天的九月把北京的夜晚刮得呼啸作响，一时间让人感到整个世界都在风中旋转，没有一点儿安宁。

我的印象中，来北京十多年，似乎九月里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猛烈如此让人感到焦躁不安的大风。通常，九、十月间的北京，给我一种舒坦。一年中难得的蓝天，难得的云彩，真正称得上秋高气爽。每当遇到这种秋天的日子，我便喜欢不时仰望一下显得格外旷远的天空，舒坦中自然包含着平静。奇怪，今年，一九九三年的九月，那几日大风来得蹊跷，顿时刮走了我等待已久的感觉。

风呼啸着掠过树枝和屋顶，天空阴沉沉，浓密灰尘被风卷起与阴云相伴，仿佛变得格外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最有感触的当然是成千上万骑自行车的人们。他们似乎也一下子失去往日那种慢悠悠那种潇洒，顶着风用力蹬车速度却依然很慢，嘴里脱口而出几句咒骂。随着轮子打转，恼怒的脸让你看出他们的心情显然焦躁了许多。

好像就在大风过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到了云南，第一次去游览了西双版纳，游览了石林。转眼间没有喧嚣没有急躁没有昏沉。我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记忆和感觉。北京真的刮过大风吗？街头骑车人真的如我认为的那样感到焦躁吗？我怀疑起自己。

那也许只是我的一种错觉？或者说，我把自己理性中观察和认识到的生活中的匆忙、困惑、浮躁、紊乱等等状态，同自然界一阵微不足道的风搅在了一起。这样，我感觉到的风，不如说是自己心中的风，自己眼中看

到的一段紊乱的日子。这日子已持续了许多时间，也许还会持续下去。

是云南的美，这种美带来的宁静感，使我产生感觉上的奇怪反差。

云南有许多奇妙与美丽，但云最令我陶醉。同是高原，新疆的云也很美，特别在北疆，湛蓝高旷的天空，云显得格外清晰、纯净。不过，就云朵的变幻和多层次的状态来说，云南的云给我的感觉显然丰富许多，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是如此。这可能是云南雨水充足气温较高的缘故。

在北京，云和阳光很少并存于天空。云南却不，明媚的阳光下，依然有大块大块的云朵飘在空中。它们呈现为不同形态。厚重者如北京的阴云，却不让人感到压抑，因为阳光将它的四周镶上了明亮，这便产生了暖意，更让人感到明与暗在空中发出的色彩的脆响。洁白而淡淡如丝的云，轻柔且最具变化，忽有忽无，仿佛一阵清风。有时在不远处的山峦，天空与森林相交之间，有一团朦朦胧胧的雾，或者云，淡青色，灰白色。据说那块云之下，正洒着雨，而周围，依然阳光灿烂。

与这样多姿的云彩相依的，是西双版纳，是石林。美不孤立于世，这也许就是大自然的造化给予云南的和谐。我的眼中，云，还有那些景致，到处都透着大自然的灵气，好像这里的万物是在艺术中浸透了之后，才又在阳光下呈现自己。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曾经有过的大风，有过的紊乱与焦躁。

二

在云南的行程虽然很匆忙，但是心境在那几天却异常地平静而充实。人平静了，就有了思考的可能。有时早上起来，就坐在窗前，呷着茶，欣赏窗外天空的云。美丽的云让我得以用冷静的目光，回望在一些日子以来看到的、感受到的迷惘与紊乱，自然它们大多都与文人有关。

近两年来，不管是投入也好旁观也好，经济大潮的冲击几乎一夜间把所有人都旋转起来，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谁也无法回避。让我时时产生紊乱感觉的正是这个现实。

在许多年的变故中，文人似乎从来都在生活舞台上扮演着主角，演出各种各样的戏剧。即使当经济成为社会的中心开始上演戏剧时，文人的失

落与迷茫，在舆论里或者在文人自己圈子的议论中，仍然不甘寂寞地充当主角，或者宁愿被拉去充当主角。民众代言人身份的淡化，甚至不再频繁地以过去那种方式遭遇悲剧性命运，这些变化都从不同角度促使文人在情感上向经济过度倾斜。当然还有默默地在故纸堆中孜孜以求的学者，还有默默地构造自己的艺术世界的文学家，但成为人们议论中心的却是“下海”的文人。他们步履匆匆，他们雄心不已。有过太多悲剧的经历，还有太不起眼的寒酸，一旦经济大潮涌起，且放下文人往昔的梦，“下海去”，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天地毕竟有它的诱惑，也有它的永恒价值。

当“文人下海”的话题刚刚成为舆论的一个焦点时，我在理性上对这样的变化为之欢呼。我认为，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是感到兴奋还是感到困惑，都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也将继续对现有的文坛结构、文人心态产生不可抵御的冲击。文人开始改变对“商”的传统看法，不管每个人所持观点是否正确，要做何种选择，这对他们自己纳入社会的正常轨道，毕竟有着积极意义。我甚至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现象的刺激下，人们可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审视自身。

文人下海，其实只是现有文坛面临改革巨变所产生的一个小小震动而已，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还会有许多人们无法预料的震动和困惑产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变化异常丰富多彩的未来，过去长期存在的结构、观念、规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这里重要的是，我认为并非文人是否应该经商，而是在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文坛结构，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里加以调整。这个结构里，当然包括着体制之类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观念和精神状态。环顾文坛，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并非所有“文人”都是真正的文人。在许多年间，因历史原因，文坛如同官场，真文人，假文人，真真假假，拥挤文坛。久而久之，文坛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坛，而是权与利的角斗场。如遇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文坛更成为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中心。

因经济改革突飞猛进而引发的“文人下海”，固然有其局限性，甚至有某种盲目性，但它却是一种重要的调整，是畸形文坛向良性转变的一个刺激。而且我相信，这样的调整和刺激，还会不断出现，在经过一个或许带有痛苦和无奈的过程后，所有文人——真的或假的——都会在社会中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也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而文坛，我相信也会因之形成一种符

合文学规律的结构。

“文”虽然不再被视为神圣，却不必为此黯然失落，这无非是把“文”置放到一个合适的高度。或全身心拥抱文学甘于清贫寂寞，或文、商全才，或时而文时而商，均视个人实际情形而定。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根据自己的特点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这正是“文人下海”现象所包含的真正意义。

不必就正确与否而对此匆忙做出判断。一切根据个人而定，一切还刚刚开始。

然而，我非哲学家，理性总是不时受到感情的困扰。当愈演愈烈的文人下海蔓延至整个社会时，我又开始迷茫了。我感觉到在渐渐失去什么。

在我眼中，下海的人匆忙的步履多少显得凌乱，恢宏的雄心多少显得空泛。以往此起彼伏变化莫测的政治运动，虽然让一些人变得成熟和执著起来，但也熏陶出一代浮躁的文人性格，这样的性格一旦介入经济大潮，尽管涉及的领域不同，但仍得到表现，只不过是采取了另外的一种方式。

文人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社会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

今年春天，北京大学校园的一段南墙被拆，加重了我的忧虑。这段墙拆掉后用来修建公司，据说是为了将大学引向市场。采取这样的举动，当然不是某个文人能力所致，可是我宁愿从这件事情的表象，偏执地去感悟其他。我不熟悉燕园，也不是学究，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报上对这个新闻的报道时，我却产生了失落，随之是一种困惑和伤感。我不由想起好久以前去北大校园拜访宗白华、朱光潜、金克木诸先生的情景，想到了我所熟悉的几位同行。在我的心目中，北大那些学者形成的稳健、厚重、朴实的学风，是一个恢宏的存在。有时我甚至把燕园想像为做学问的一方“净土”。

南墙被拆了，我的心绪乱了，所谓的“净土”也失去了往日意义。

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当我在昆明的云之下去寻访西南联大旧址时，原有的目的之外，便又有了新的冲动。

三

西南联大在我并不陌生。我以往研究过、描述过的巴金、萧乾、沈从文，都同这里有过密切关系。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巴金的妻子萧珊，曾是

西南联大的学生，为此巴金曾在西南联大居住过，也是沈从文家中的客人；萧乾的第一位妻子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并且还是萧珊的同班同学。不过，此次追寻西南联大旧址，不是为了人的行踪，也不是为了某一种具体的历史存在。我是在继续着我在北京就早已开始的追寻。

我在追寻一个已经破碎的梦，一片往昔的灿烂落霞。

一个沙龙梦。

一九八五年，我在创作《萧乾传》时，曾写过这样一章：“迷人的沙龙，挂着一幅蒙娜·丽莎神秘的肖像”，以此来描述三十年代初刚刚开始小说创作的萧乾，在走进以林徽因、朱光潜、沈从文等人为中心的“京派文人”沙龙时，所看到所感受到的新奇。

“京派文人”的沙龙，以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及金岳霖的住所和朱光潜、梁宗岱的住所为中心。参加者大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或是诗人，或是小说家，或是哲学家，或是艺术家。除沙龙主人之外，他们中间还有沈从文、杨振声、萧乾、卞之琳、何其芳、林庚等，朱自清、废名、周作人也时而参加。几乎每个周末，他们便会聚到林徽因家中或者朱光潜的住所，举办读诗会，或者随意性地漫谈。

“京派文人”沙龙，可以看作是二十年代新月派诗人沙龙的延续。闻一多的客厅，除窗户外，墙壁上贴满黑纸，拦腰又镶上一道金线，在徐志摩的眼中，它好似一个裸体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上细金圈。闻一多和他的诗友徐志摩、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等，就在这样一个奇特的沙龙里，掀起现代新诗的一个新浪潮。

现在的这个沙龙，没有新月派的那种浓烈而怪诞的情调，更趋向于平淡与自然。哲学家美学家的加入，使之于诗人的浪漫之外，又多了些学者的风范，沙龙的内涵更显得丰富而具有兼容性。留学欧美归来的哲学家、诗人，来自湘西的小说家，来自校园的年轻人，在这里构成一个整体。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概括他们，他们的人生观、文艺观也不尽相同，但这个沙龙有一个共同的灵魂，那就是艺术。就性格而言，他们更趋向于平和沉稳，决不浮躁，以独立的人文精神体现自己的价值。

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他们基本上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范畴。生活条件（包括收入、住房等）较为优裕和稳定，迷恋文化的独立创造，主张文艺创作中感情的克制。对于政治，则保持相对超脱和独立的态度，从而

显出思想的个性。除沙龙这种形式之外，他们还有编辑出版的《文学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作为园地，从而形成了有着坚实基础的文化圈。

这的确是一个具有艺术魅力具有高贵气质的沙龙。当年轻诗人何其芳朗诵新作时，当朱光潜和梁宗岱讨论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柔性美和刚性美的区别时，当林徽因侃侃而谈艺术家的观察力和感觉力时，一个艺术的精灵翻飞于客厅之间，翻飞于他们的心灵之间。

相对平稳的北京让这批文化人得以平和地陶醉于文化之中，得以将从西方文化中感受到的艺术精华，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培育出新的树木。在战乱的时代，在人们的各种情绪跌宕起伏的环境中，这样的氛围也许显得过于贵族化，这样的沙龙，也许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样一群执著于文化创造有着强烈个性色彩的文人，构成了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沙龙，没有这样一批文人的成就，三十年代的文化，必然显得单调而逊色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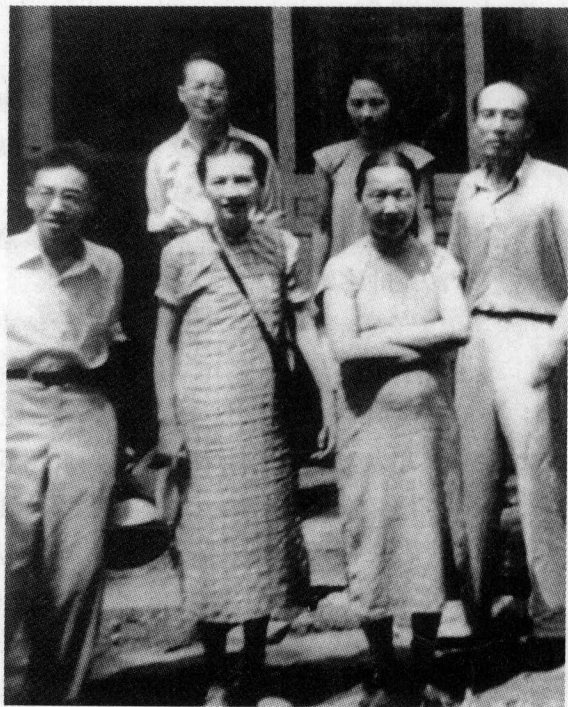
沙龙的价值，不在于参与者的多少，关键在于它拥有的一种精神，一种气质，在于它的参与者表现出来的一种文人性格。而这，对于文化创造和人格的孕育是极为难得的。

我不由想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文学中的著名团体“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我翻译过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E·M·福斯特的一些作品，从关于这个文化沙龙的介绍中，我觉得“京派文人”的沙龙，与伦敦的这个文化沙龙，在气质上性格上有许多相似。

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间，活跃于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在英国现代文坛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主要成员有伍尔夫夫妇，伦纳德·伍尔夫是出版家、评论家，曾主编过《观察家》杂志，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小说家；画家贝尔夫妇，妻子瓦尼萨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创作过《维多利亚女王》等著名作品，卞之琳翻译过这种作品；经济学家凯恩斯；以翻译和研究中国、日本文化著称的阿瑟·魏理。后来时常参加的还有小说家E·M·福斯特，《印度之行》、《看风景的房间》、《小说面面观》的作者；哲学家罗素、诗人T·S·爱略特等。

一个群星灿烂的团体。他们的沙龙以贝尔夫妇家和伍尔夫夫妇家为中心，地处伦敦的文化中心地带布卢姆斯伯里，南边是不列颠博物馆，西边是伦敦大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批文人构成自己特殊的文化圈。“布卢姆

“京派沙龙”的主要成员沈从文、张兆和与梁思成、林徽因等友人在一起。



斯伯里”因此而闻名。

这也是真正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的沙龙，他们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属于中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相互之间各有差别，但都横溢着才气，追求真善美，认为人的关系是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生命则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存在或者是一个谜。这些被认为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实质。

他们和“京派文人”在人生态度和气质上，都有着相近之处。在学者们看来，他们的创作追求一种美丽趣味，生活中追求着轻松，从而获得闲暇的感觉。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表现出的自由主义精神，无论艺术或者政治，他们总是坚持着个人独特的见解，甚至不因为它的偏颇而改变自己。伦纳德·伍尔夫说过一段话，很能概括“布卢姆斯伯里”的特点：“在剑桥大学摩尔先生（著名哲学家——引者注）房间的人们，如果认为一件事情不深奥不真实，他们就难以称其是有趣的，同样如此，布卢姆斯伯里的人们，如果认为一件事情没有趣，他们也难以称其是深奥的或者真实的。”譬如他们重视个人友谊，福斯特就曾将之发展到极致，他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国家和友谊之间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友谊。”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固执，反映出他们沉稳的文化性格。

四

好几年前，我在北京寻找过“京派文人”沙龙的旧址。

林徽因的家在东单北总布胡同，朱光潜的住所在景山附近的慈慧殿。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已经变得非常拥挤的北京胡同，去寻觅它们的踪影，但一无所获。问沈从文夫妇，他们就他们连林徽因的家也未找到过，虽然七十年代他们就住在总布胡同附近。

他们去寻找，是想重温当年暖意。我呢？现在想来，大概是感叹一个沙龙的终结。

直接导致“京派文人”沙龙结束的原因是日本人燃起的战火。在北京沦陷之前，文人们不能再在他们的沙龙里陶醉文化的梦想。大家各奔东西，到昆明的人数较多，而且基本集中在从北方南迁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他们中间有沈从文张兆和夫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朱自清、杨振声、萧乾等。沈从文告诉我，到昆明后，大家开始还时常在林徽因家里聚会，这大概可以算是北京沙龙的余音。但随着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这样的聚会也无法继续，最终无奈地烟消云散。

在西南联大纪念馆展厅里，浏览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图片和实物，我心中的感伤是不言而喻的。联大教授破旧的泥屋，简陋的铁皮屋顶的教室，闻一多、沈从文、杨振声、冯友兰、游国恩等十二人为生计而张贴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轰炸后的废墟，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它们同那个充溢着艺术氛围的悠闲沙龙联系起来。

但是，我想，对于那些曾经出入过北京“沙龙”的文人，形式上的沙龙的消失，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心中“沙龙”的消失。在以后的岁月中，尽管历经战乱，历经种种政治风雨乃至文化浩劫，他们沉稳的文化性格，在摔打滚爬之后，在磨难和惶惑之后，仍然显出其本色。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创作，汇入了文化长河。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仍迷恋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在荒山古庙里踏勘，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资料和成果。沈从文在经历灵魂大搏斗之后，默默地在故宫博物馆的高墙深院里潜心于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历三十年之艰难，其踏实和毅力依然不减，终于写出具有开创性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萧乾在成为“右派”之后，不能公开发表作品，但他仍然在艰难环境中用笔名来从事文学翻译，《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伟大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等，证明出他人生的价值。还是这样的沉稳，使他在晚年，进入生命的又一个辉煌时期，用近百万字的创作，再次表现出他的才华。卞之琳在创作诗歌的同时，成为莎士比亚研究的专家，